

★ ★ ★

党外人士眼中的毛泽东

黄炎培眼中的毛泽东

新中国的缔造者

□ 韩晓青

1945年7月，国民参政员一行6人到访延安，黄炎培和毛泽东之间有了一次著名的“窑洞对”。黄炎培不仅是毛泽东推心置腹的党外好友，也是诗情相通的诗友。黄炎培视毛泽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认为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也是“中华人民领袖”，更是一个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

1945年6月11日，中共七大闭幕，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史册。与中共七大几乎在同一时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大，却走了一条与人民利益相反的道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不参加由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和之后召开的国民大会，国共关系陷入紧张。这种紧张的局面引起了中间势力的严重不安。6月2日，黄炎培等7位国民参政员联名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6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黄炎培等人，表示愿意商谈，并欢迎他们来延安。7月1日，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其中一位因病未成行）从重庆飞抵延安。

在延安，毛泽东同参政员们就国共关系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在同黄炎培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回答：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感叹：“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短短5天的延安之行，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结束延安的访问之后，黄炎培在很短的时间内写了《延安归来》。黄炎培在书中谈到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依我看来是一位思想丰富而精锐又勇于执行者。”《延安归来》出版后，几天之内就被抢购一空，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中华人民领袖”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河北西柏坡，3月25日清晨到达北平。当天下午，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1000多人见面，黄炎培、沈钧儒等人就在其中，之后举行了阅兵式。当夜，毛泽东入住香山双清别墅。

毛泽东会见的第一位客人便是黄炎培。黄炎培后来在日记中记载，“夜，毛主席单独独餐于其家，香山双清别墅，毛夫人、周恩来4人同餐。我畅述所见，获得具体结果三点”。为什么毛泽东要单独邀请黄炎培呢？除了两人深厚的友谊和私交，还因为毛泽东清楚黄炎培本人虽然不是实业家，但他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实业家中有着巨大影响力。晚宴上，毛泽东与黄炎培沉浸于别后重逢的欢乐之中，长谈良久。黄炎培表示他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不辜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

人对他的信任，尽力做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共同为振兴中华服务。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黄炎培等民主党派和社会著名人士被邀请参加，黄炎培当选为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议期间，黄炎培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10月1日，这是黄炎培终生难忘的日子。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开始，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黄炎培热泪盈眶，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今天终于看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新生的中国、人民的中国诞生了！

当天晚上黄炎培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息！他激情澎湃、文思泉涌，写下了一首组诗《天安门歌》，以纪念这不平凡的一天。这首组诗共9首，其中第二首是这样的：“大野秧歌四起，红颜白叟黄童。中华人民领袖，出一个毛泽东。”诗言志、歌咏情，黄炎培用诗歌形式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祝福和祝愿！

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黄炎培和毛泽东有许多共同的爱好，如写诗填词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多次复信黄炎培，谈及诗作；在黄炎培眼中，毛泽东不仅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位饱含激情、富有文采的诗人。

1950年8月香港新中国画报社出版了黄炎培的新作《红桑》。卷首有同年3月19日黄炎培所作《前言》，收录新诗15首，时间跨度从1938年11月23日至1950年3月11

日。诗集出版后，黄炎培将其送给毛泽东。1950年9月1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回信：“大示敬悉，承赠大作《红桑集》，极为感谢。”

1956年9月，黄炎培将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呈送毛泽东观赏。张叔通时年已经80岁，花了一年时间作了画，并为每幅画自加了跋语，汇集成册。黄炎培和张叔通相交多年，知道张叔通惜墨如金，能作画却很少作画，有感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农村和工商界对共产党的领导极为称颂，才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做书画册一本。黄炎培特地为其写了一首长诗。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是本着极高度诚意而写出来，特代陈，乞赐教；我的诗附求赐教！”毛泽东回信说：“画册、叙诗和另诗三首均已收到，十分感谢！”

为了表示对黄炎培多次赠诗词的谢意，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将自己之前填写的两首词书赠黄炎培，并在信中说：“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这两首词就是《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长江》。这两首词是毛泽东在北戴河与长江游泳之后所作，当时尚未定稿公开发表，足见他黄炎培的友情和诗谊非同一般。

黄炎培读后深感欣慰，建议毛泽东公开发表两首词。毛泽东在同年12月16日的回信中说：“前信无甚深意，以不发表为妥。水调歌头：逝者如斯乎的‘乎’错了，请改为‘夫’字。”后来黄炎培又因对词作中“极目楚天舒”句不甚理解，致信与毛泽东推敲。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解释说：“游长江二小时飘三十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游侧游，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1950年10月，为纪念在不同革命时期因解放事业献身的20多万名湖湘先烈，湖南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修建湖南烈士陵园和纪念塔的决议。1959年建成的湖南烈士纪念塔，矗立在湖南省长沙市湖南烈士陵园的茂密松柏之中。纪念塔塔塔合一，呈八角柱形，整体建筑通高58.6米，塔身正南面镶嵌一块20米高汉白玉纪念碑，镌刻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湖南烈士公园纪念碑”九个镏金大字。塔的下方设有纪念大厅，纪念大厅的正中立一石碑，下嵌阴刻碑文。全文如下：

近百年来特别近三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光荣牺牲的湖南人民英雄烈士们永垂不朽

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谨建
公元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奠基

这篇简短的碑文，概括梳理了中国自近代以来湖湘优秀儿女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舍生忘死的光辉历史。碑文中“近百年来”，即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整个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奋斗历史；“近三十年来”是指1919年至1949年的历史，即以五四爱国运动为发端到湖南和平解放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中华民族的复兴，一代又一代湖湘优秀儿女英勇奋斗、艰辛探索，对20多万名湖湘革命先烈的最终评价，浓缩成一句话，即“湖南人民英雄烈士们永垂不朽”，充分表达湖南人民对先烈们的深切缅怀。在碑文中，落款以“湖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名义“谨建”，时间“1951年12月13日”是奠基日。

（一）

鸦片战争以来，湖湘儿女为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革命斗争精神，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努力，千千万万的湖南人民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牺牲的革命烈士和被杀害的革命群众达100多万人。为革命事业英勇献出宝贵生命的湖南籍在册革命烈士有15万，已查明的革命烈士约20万，他们的光辉思想、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值得永远铭记和传承。

早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被欺压地位，为了消除贫穷、苦闷的根源，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中苦斗。谭嗣同从事维新变法活动，1898年9月惨遭清政府杀害。刘道一参加华兴会和同盟会等革命团体，1906年12月因策划反清的萍浏醴起义被杀害。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宪政之父”宋教仁，1913年3月被袁世凯派人暗杀。蒋翊武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起义成功后在赴广西途中被捕，1913年9月被杀害。辛亥革命先驱和领袖黄兴，因积劳成疾，1916年10月在上海病逝。近代著名的革命家、军事家蔡锷，一生“反清、抗袁、拥孙”，1916年11月，因喉病恶化，不愈逝世。

（二）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掀开了湖南人民革命新篇章。在中共湖南地方组织领导下，革命先辈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三湘大地重大事件不断。1922年1月，劳动阶级的先驱、湖南劳工会首领黄爱、庞人铨在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的斗争中被捕，翌日凌晨壮烈牺牲，两位年仅25岁的工人领袖，成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军阀斗争的第一批牺牲者。李大钊在《〈黄花岗血记〉序》中说：“中国社会运动史的首页，已由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以下的空白怎样写法？要看我们的努力了！”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不到两个月时间，在长沙及周围各州市被屠杀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妇女，达1万余人。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田波扬，以及他的爱人等先后在此期间被反动派杀害。7月，汪精卫公开背叛革命，对湖南

湖湘优秀儿女舍生忘死的历史见证

——湖南烈士纪念塔碑文敬读

□ 黄力

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开展“清乡大屠杀”，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1300余人。半年间，仅经立案的共产党人即达1723人，处徒刑373人，至于被滥杀的更不可胜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中共长沙市委书记涂正楚、长沙县委书记仇寿松、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等，就是这一艰难时期无数湖湘革命英烈的代表。

进入全面抗战阶段，湖南人民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爱国情怀，为了抗战的胜利不怕牺牲、前赴后继。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直至1944年8月衡阳沦陷，湖南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军民同10万日军长期对峙，反复拉锯，进行了三次长沙战役、常德战役和长衡战役等多次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敌我双方参战兵力之多、战争规模之大、伤亡之惨重，在全国各地战场均属罕见。其间，中国共产党先后派遣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和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在湖南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同中共领导下的湘鄂赣边红军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游击战争，发动沦陷区人民进行抗敌斗争。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兼新四军平江留守处负责人涂正坤、中共湘鄂赣特委组织部部长罗梓铭等多位先烈在此期间壮烈捐躯。

在1946年6月开始的解放战争中，党领导湖南人民同反动势力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49年9月至10月，衡宝战役歼灭白崇禧盘踞湘南负隅顽抗的精锐部队近4个师，将其余部逐出省境，为湖南解放打下重要基础。在解放战争期间，湖南共有近百支成规模的兵匪势力被人民解放军剿匪部队消灭，大批国民党正规军的残余部队起义或向人民投诚。至此，长期以来给湖南人民带来灾难、给社会生活带来动荡和恐怖的匪患，真正打上一个句号。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洗礼，湖南英才辈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作出了丰功伟绩。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中央苏区时期如何提升党支部战斗力

□ 邱华林 睦京城

党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中央苏区时期，我们党非常重视支部建设，在党的各级组织、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红军的连队中均建立了党支部，并通过一系列举措来加强党支部建设，使得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有了新的提高，有力推动了各项革命事业顺利开展。

注重思想建党。当时，为了迅速壮大革命队伍，我们党大量吸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成分的人入党，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一度蔓延。因此，对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思想建设就成为十分紧要的问题。在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 and 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具体实践中，主要通过开办各类学校和训练班来加强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工作。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陆续开办了马克思主义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等。其中，1933年3月创办的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是中央党校的前身。该校分设三个班：新区工作人员训练班，党团、苏维埃、工会干部训练班，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科目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中共党史、历史、地理等。同时，还举办各类训练班，如支部流动训练班、新党员训练班等。这些班次对培训的内容和时长作了明确的安排。以“支部流

动训练班”为例，这个班培训对象为支部工作骨干，要求每星期授课2—3次，每次2小时，授课内容包括“党员须知”“支部工作”“查田运动”“党与苏维埃”等。绝大多数支部工作骨干接受培养训练后，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了很大提高。为配合教学，在印刷出版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顺利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组织力量编写了《中国革命问题》等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常识读本，供学员当教材使用。在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同时，通过严格规定入党程序，对新吸收的党员设置入党考察期，举行入党仪式，帮助他们认识党的性质和宗旨，有效提升思想觉悟。

完善制度建设。针对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党内生活存在的一些问题，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组织部部长任弼时起草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指出：“党的支部工作必须有彻底的转变，要使支部真正成为党与群众的连环。”如何实现“彻底的转变”？党的力量来自组织，要转变还得从组织建设发力，从完善制度入手，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截至1932年，江西省14个县1089个乡，共设立998个党支部，形成了以乡为单位建立党支部、以村为单位建立党小组的组织形式，在中央苏区广泛建立了严密的基层组织。在基层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同时，我们党注重通过健全

制度抓好支部干事会班子建设，使党支部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支部干事会实行个人负责制，让每个干事专注于一份具体工作；人数较多的支部，可增加干事会人数，并明确好分工。从1932年起，每年在全苏区范围内进行一次“支部改造运动”，发动全体党员对支部领导成员进行民主评议，在评议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清除那些不称职的支部领导成员，选举那些觉悟高、工作积极的党员担任支部领导。这一制度安排，有效提高了支部班子领导能力。为了使支部生活能正常开展，各级党组织还建立健全了党支部其他各种制度。其中，“会议制度”规定支部委员会每7天召开一次，小组会每5天召开一次，支部党员大会每个月召开一次，红军中支部会议的时间和次数，根据战斗的环境来转变；“党费收缴制度”规定党员每月交党费铜元5枚，连续3个月无故不缴者按自动脱党处理，所收党费一部分留给区委使用，20%留给县委，40%上交苏区中央局组织部；“工作报告制度”规定支部要定期向区委、县委报告工作。这些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支部工作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基层党支部工作有章可循、有条不紊地进行。

建设模范支部。1928年，党的六大提出“须有模范支部的建立，以创造党的支部生活”。中央苏区积极贯彻，在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过程中，苏区各级领导

机关很注重建立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的工作，注意抓好典型，以点带面。1932年夏，苏区中央局组织部提出：每个区都必须有计划地建立一两个中心支部和模范支部。根据这个要求，各地陆续确定和建立了一批以兴国县长冈乡支部、高兴乡黄群乡支部，胜利县平安乡支部、梅窖乡三僚支部，长汀县松林、杨背、涂坊支部，红军十三团九连支部等为代表的模范支部，并对模范支部给予表彰并推广经验。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表扬：“兴国的同志们创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们称赞他们为模范工作者。”1933年，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5期刊发的《一个模范支部的工作报告》中，介绍和推广了兴国县黄群乡模范支部的事迹和经验，“每次会议能按时到，有十分之九能发言。支部和干事会能讨论到苏维埃赤卫军等工作，如乡代表会议制度，紧急集合等，在每次支部会前，能有充分的计划和讨论”。除了宣传推广模范支部的经验，每个区委和支委还从模范支部征调干部，组织突击队去加强和突击落后支部的工作。以开展模范支部建设带动一般和后进支部的工作，调动了党员的积极性，如扩红运动中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瑞金县黄柏区的大柏地支部整个支部加入红军，保证了扩大红军、经济动员等任务的完成，有力支持了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革命战争。